

《陈情表》、《归去来兮辞》、《拟行路难》 窥探魏晋名士选择隐逸的原因？

谷彩红

(深圳市西乡中学 广东 深圳 518102)

【摘要】一说到中国哪个时期隐士最多，首当其冲的当属魏晋时期（特别是东晋），据统计魏晋时期有史料可记的隐士就多达有一百多位，再加上不在《隐逸传》但具隐逸行为的士人就更多了。在这些隐士的推动下，这一时期掀起了一波隐居的浪潮，是什么因素产生了如此众多的隐士，推动了隐逸风尚的形成和发展。隐逸这个词早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隐逸现象也在先秦时期存在，再历经秦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很高的发展程度。

【关键词】魏晋；名士；隐逸

**“Chen Qing Biao”, “Return to Xi Ci”, “Road to travel difficult” to
explore the reason why the wei and Jin famous scholars choose seclusion?**

Caihong Gu

(Shenzhen Xixiang Middle School, Shenzhen, Guangdong, 518102)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which period in China the most recluse, the first is the Wei and Jin period (especially the Eastern Jin),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hermits in the Wei and Jin period that can be record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plus there are more scholars who are not in the “Recluse Biography” but have recluse behavior. Driven by these hermits, this period set off a wave of seclusion, what factors produced so many hermits,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clusion. The word “seclusion” had emerged as early as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phenomenon of seclusion also existed in the pre-Qin period.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in and Han periods, it reached a high degree of development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Wei and Jin dynasties; Famous scholars; Seclusion

1 时局动荡，社会动乱，名士为了明哲保身无奈选择归隐

社会的动乱始于东汉末年，当时不同阶级之间及阶级内部的争夺变得激烈，很多士人宁愿隐于山林江湖也不愿涉身政治，尖锐的社会矛盾日益造成，贤士伏处大山堪岩之下的局面出现。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先后经历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三国鼎立，司马篡位，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对峙。

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小序中分析做官原因的时候提到“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因为社会动乱，战事不断所以陶渊明有做官的机会。“于时风波未静，心悼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这句是在说为什么选择去做彭泽县令？因为战争风波未定，所以不敢离家太远。动乱的社会环境既给了陶渊明出仕做官的机遇，又让他在动乱不安中无法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整篇《归去来兮辞》654个字而小序就有240个字，可见小序是文章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小序介绍了文章的背景和辞官归隐的

主要原因。陶渊明曾经五仕五隐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任江州祭酒。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谧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

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鲍照的一生也是在颠沛流离当中度过的，仕途坎坷不顺，做过很多人的幕僚，最终也是在战争中死去。

《拟行路难》鲍照写了18首人生的道路真的太艰难，让这样才华横溢的魏晋才子郁郁寡欢，一个时代“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踴蹶不敢言！”^[1]，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尽情宣泄，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踴蹶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踴蹶”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没有人可以跨越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动荡的时代，传统的仕途道路无法走通就只能另辟蹊径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名士们选择离开官场，走向山林，踏进田园生活。

2 门阀制度，等级界限，寒门没有阶级跨越的途径：

士族门阀是以宗族为纽带而形成的封建特权集团，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门阀士族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等级界限十分明显。不仅如此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很大，几乎把持了朝政，而那些寒门族子弟主政治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任低级小官，被排挤在

世族上层社会之外。普通的士人很受打压，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拳脚，最终只好选择归隐山林，归隐田园。

鲍照《拟行路难》中对“门阀制度”愤愤不平“泄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把水倾到平地，水会流向东西南北，会按照地势的高低。就想人生一样，人的命运和流水一样无法自我掌控，出生就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鲍照满腔的不满和愤恨从诗歌的开始就表露出来了，接下“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作愁“。多少个发奋读书的夜晚，多少篇投赠的书稿，多少次和命运进行抗战，让一位才华横溢的寒门学子不得不向命运低下高贵的头颅，鲍照出生于一个低级士族家庭，因家庭贫困而年少时曾从事农耕，是寒门子弟的典型代表。

陶渊明虽然是士族但是到他生活的时期已经家道中落了，也是出生比较低微，虽然曾经多次做官但是都是小官，没有机会晋升高位，例如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陶渊明在担任江州祭酒时是王凝之的下属。王凝之书圣王羲之之子，王姓大家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时士族大家，王凝之字写的不错，但是做官没什么能力，曾经所驻扎的地方遭受外敌入侵，他企图用画符请鬼兵抵御入侵，所以陶渊明对王凝之这个上司也颇为不满。第一次做官就能感受门阀制度的压迫，也为以后辞官归隐埋下伏笔。《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一次次出仕，又一次次归隐，早就看清官场的黑暗了，让本性崇尚自然，追求高洁的陶渊明如何能忍受。所以“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决定归隐内心轻松愉快，归心似箭。李密《陈情表》“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李密也是寒门出生，家族到他这辈同样家族没落，所以一直没做过太大的官，虽然被司马炎多次征召，但是司马炎更多是在拉拢人心，装点门面，让天下的名士看看，虽然李密是亡蜀旧臣，但是新政权依然愿意启用他。

此外对于寒族的管理，门阀士族选择了以“孝”治天下。他们大力提倡孝悌之义，如此一来“孝”就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在寒族士子眼中此时的朝堂早已没有吸引力，刚好可以借孝道之名，选择

隐逸生活，从而不履行为官或尽忠的义务。毕竟“自古忠孝两难全”，既然选择了“孝”，那么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放弃了“忠”。李密就是以“孝”为名，拒绝了司马氏的征召。“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李密故意避开“忠”而不谈，反复强调不做官的原因是“孝”并且抓住的晋国的国策，从国家政策“孝”入手，让司马炎哑口无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司马炎只能同意他的请求，不能拒绝。“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不去做官的理由只是为了尽孝。祖母魂归道山之后，李密已经没有借口了，他履行了在《陈情表》的承诺。先后任温县县令、尚书郎、汉中太守等职。任期内，他在汉中勉县倡建武侯祠，那是对故国的追忆么？然而，那来自“竹林七贤”的余韵，尽管不露痕迹，但终有一天被酒力唤醒了。某天他酒后赋诗：“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激怒晋武帝，免官回乡。

3 思想开放，兼容并包，为魏晋名士归隐提供思想路径。

鲍照生活的时代是社会思想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崛起于寒族的皇权打破了士族垄断朝权的清静生活。出于统治的需要，当权者大力提倡儒学，宋武帝刘裕建国后就“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宋书·本纪第三·武帝下》），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十五年在京都设立儒学馆，十九年下诏修复孔子故里学舍，二十三年亲幸国子学策试诸生，并多次给予嘉奖和资助[2]。刘宋经学尤以《礼》学为盛，聂崇岐先生作《补宋书艺文志》，辑录刘宋一朝三礼著作，凡三十一种，实际当远不止此数。其中，臧焘、傅隆、王淮之、王弘、雷次宗等人都精于“三礼”。其时许多士人都用心于儒学，呈现出儒、玄、佛兼修的思想状态。如戴逵著《逍遥论》，又注《礼记中庸篇》，王僧虔既擅长于谈玄，又精于《礼》、《乐》。儒家思想成为贯穿刘宋一朝的主流思想，在振奋士风人心方面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并为齐梁经学的逐步繁荣奠定基础。儒学之外，史学也逐渐繁盛。

与此同时，高门大族的政治根基并未动摇，玄风虽然渐消，但习老庄谈玄理之风依然存在。如王僧虔在《诫子书》中曾谈到：“汝开《老子》卷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3]可见谈玄之风并未消失，只是影响大不如前。自东晋出

现的玄佛合流开始悄然生变，即对义理的阐释和探究逐渐减少，在对佛经的接受过程中，逐渐培养重语言、重音韵、重美的感知。多形成以儒学为主、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拟行路难》中也是可以看出这种积极抗争的儒家思想和替天由命道家思想的并存。

陶渊明的出仕和归隐表明他受到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的影响，他出自官宦之家，书香门弟，虽然家道中衰，但家中藏书丰富，又受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养成陶渊明爱好读书的习惯。对于儒家诗书，六经之类的书籍，自少年时代起就有所偏好。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陶渊明思想的基础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动荡不安，影响到社会风气与学术思潮，在大动乱中，老庄哲学思想，便乘机而来，应运而兴。研究老庄，既成一股风气，影响所及，陶渊明亦必有所涉猎，在儒家思想不能真的解决现实问题，那么陶渊明必定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中求得满足，他吸取老庄哲学中的精华，排斥其中的糟粕，这也是由于渊明的识见超拔不同凡俗，有以致之。

《归去来兮辞》中“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表达了一种顺应自然、不复强求的思想，是陶渊明的隐逸思想。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句话，从一个积极入世、努力体现个人的社会价值的人来看，是消极的，是悲观的是不符合儒家思想；但由其本人来看，未必是消极的。隐逸思想在古代中国文人中是相当盛所有很多人都想出仕的，他们在隐逸中自得其乐，甚至从中寻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真义，发掘人生的某些哲理。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

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参考文献：

[1] 田梦琪.“魏晋风度”美学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时尚转化研究[J]. 纺织报告, 2022, 41(12): 53-55.

[1] 赵浩, 向芳.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音乐审美活动及其精神意蕴[J]. 枣庄学院学报, 2022, 39(06): 126-136.